

经济学隐喻：兼议经济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彭长桂 赵国昌

摘要：如何讲好中国发展的经济学故事，发展出原创性的新理论新思想，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本文发现，在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隐喻往往有助于找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看不见的手”等经济学隐喻具有喻体凸显而本体隐蔽的语言结构，其真值条件为不同概念域的逻辑类比和经验映射，因而在理论创新和社会沟通上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经济学隐喻可以将一般隐喻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对理论呈现进行穿透性解释和说明，帮助经济学理论完成从抽象概念到经济现实的语境还原，获得抽象概念和鲜活经验的深度融通。同时，经济学隐喻在社会沟通中具有独特优势，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文献实证统计结果显示，诺奖得主普遍使用隐喻阐述思想，且隐喻对思想传播具有促进作用，对高被引研究的传播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隐喻对讲好中国经济学故事的启示。

关键词：隐喻 经济学 方法论 理论创新 科学沟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最好的研究田野和最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也提出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现实需要。然而，正如著名哲学家赵汀阳所批评的，“中国经济学一直都非常活跃，对中国的变化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描述和讨论”，但是“还没有提出具有创造性而又有明显说服力的理论模型”（赵汀阳，2018）。无独有偶，经济学

[作者简介] 彭长桂，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changguipeng@126.com；赵国昌（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610074，电子信箱：guochangzhao@swufe.edu.cn。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7237311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23YJC790069）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2022年6月16日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学术例会和2022年9月17日第十四届语言经济学论坛上报告，感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姜树广教授、李增刚教授和苏剑副教授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界也有类似批评：“中国经济学缺乏原创性的学术创新，不仅因其学术底蕴不够厚实因而缺乏想象力，而且对于崭新现象的观察、刻画和解释缺乏学术穿透力……”（金碚，2019）经济学界还反思了经济研究中妨碍思想创新的过度数学化，甚至“数学滥用”（Romer，2015；陆蓉、邓鸣茂，2017）。因此，如何讲好中国发展的经济学故事，发展出原创性的新理论新思想，是中国经济学界正在面临的共同挑战。

近年来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在《美国经济评论》等英文顶级期刊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实证研究论文（Song, Storesletten, and Zilibotti, 2011; Huang et al., 2017; Cao and Chen, 2022），这说明中国经济学界逐步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开始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然而，“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做出贡献，能够在国际经济学界引领新概念、新思潮的，基本上还未出现”（林毅夫，2017）。纵观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的经济思想史，隐喻的使用正是思想创新的重要表现和有力工具。

在经济学里，隐喻不仅普遍存在，甚至还是经济学家赖以生存的载体（McCloskey, 1983, 1995; Lakoff and Johnson, 2003）。然而，在已有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隐喻更多被看作一种普遍而重要的修辞现象，对它的方法论意义少有涉及（McCloskey, 1983, 1990; Shiller, 2017; 郭贵春，2004）。

经验证据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合适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对过去的科学实践的一般化描述（Blaug, 1992）。本文依此逻辑对经济学中的隐喻现象进行系统考察，阐述隐喻的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余下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说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科学隐喻现象及其对科学理论发展的方法论贡献。第二，对“看不见的手”等著名经济学隐喻进行简要回顾和语言学分析，探索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和真值条件。第三，讨论隐喻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价值。第四，阐述经济学隐喻在社会沟通中的独特优势。其中，本文对1969—2022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作品隐喻使用情况进行了文献实证统计，结果显示，诺贝尔奖得主普遍使用隐喻阐述自己的思想，并且隐喻对思想传播具有促进作用，对高被引研究的传播具有显著影响。第五，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隐喻对讲好中国经济学故事的理论启示。

一、科学隐喻及其方法论贡献

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很多重要成果都有一个看起来不太科学的隐喻起源。早在1912年，《科学》(Science)就有文章讨论了这种隐喻现象：最初由某种隐喻表达表示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具体的存在(Harris, 1912)。与诗歌隐喻或文学隐喻不同，科学隐喻是一种致力于理论建构的概念隐喻，被广泛而富有成效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Boyd, 1993; Lakoff and Johnson, 2003)。隐喻的本质就是根据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事物，在建立科学语言与世界的联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Lakoff and Johnson, 2003; Kuhn, 1993)。

在自然科学里，力、热、光、细胞等基本概念都是以人类身体经验为原型构建的隐喻，它们奠定了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安军, 2017)。在物理学的光学领域，有两个著名隐喻。1704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光学》一书中提出光的微粒理论，使用了“光是微粒”的隐喻，这一隐喻在光的概念化和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一个世纪后，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提出了“光是一种波”的新隐喻，发展出光的波动理论，使光学获得里程碑性的新发展。化学里的“分子”概念是一种典型的结构隐喻：把分子结构理解和描述为平面或立体的特殊组成模式。1856—1857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凯库勒(Friedrich Kekule)将甲烷的分子结构表征为一种平面图式，这种二维结构思想为化学的现代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雅各布斯·范霍夫(Jacobus van't Hoff)和约瑟夫·勒贝尔(Joseph Le Bel)提出的三维结构分子新隐喻直接推动了立体化学的整体发展。著名的生物学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隐喻模型。由于DNA的微观世界超出了直接观察范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使用宏观世界的三维对象进行分析推理，获得了微观世界结构和属性的标志性认识(Brown, 2003; 安军, 2017)。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作为理论预设的基本隐喻正处于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的更替过程中(李河, 2020)。这些情况说明，新的隐喻就是“整个科学界的财富”，众多科学家跟进探索该隐喻的各种变体，从而推动科学发展(Boyd, 1993)。正因为新隐喻给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贡献，有科学

哲学家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隐喻革命”(Arbib and Hesse, 1986)。

在社会科学中,科学隐喻同样参与和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并且很多著名隐喻已经成为世界上广为接受的基础典范。柏拉图(1986: 281 - 321)《理想国》第七卷以“洞穴隐喻”来生动地展示知觉与真实的关系。这个隐喻至今仍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如何走出自己的洞穴是每个时代都面临的难题和困境。霍布斯(1985)用《圣经》中的海中怪兽“利维坦”对国家进行隐喻阐述,指出国家是“有朽的神”“人造的神”,建构了现代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秩序称为囚禁人性的“铁笼子”,成为现代化和制度研究的奠基性思想(Weber, 2001)。“人是机器”和“人是动物”分别是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原型隐喻,对心理学发展做出了里程碑性的重大贡献(Watson, 1924; Freud, 1952)。

这些情况说明,科学隐喻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而且极大地参与和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对科学理论具有发明、表征、说明、评价、交流等方面的方法论贡献(郭贵春, 2004)。因此,隐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二、经济学中的著名隐喻及其语言学分析

(一) 经济学中的著名隐喻

自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开始,经济学的发展就逐渐被数学的形式化语言所支配,以保证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和可靠性。然而,经济学的科学隐喻或隐喻性陈述仍然普遍存在,因为“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隐喻发展起来的”(金碚, 2019)。

1. “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理论的原型隐喻。在《国富论》中,斯密的矛头指向当时严格管制价格和限制竞争的重商主义经济制度,主张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在处理人们为什么要工作和在市场上提供产品这个市场分工和交换的基本问题时,斯密回答了一句反复被引用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

的打算 (Smith, 1977)。因此, 斯密认为, 为自己谋利才是增加国家和全体国民福利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市场机制中, 不管是手艺人 and 劳工, 还是资本家, 做决定时都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Smith, 1977)。在《道德情操论》中, 斯密再次使用这个隐喻描述市场机制的影响: 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相同的分配 (Smith, 2002)。

“看不见的手”是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隐喻。在斯密看来,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把个人的自利行为转化为共同的社会福利, 通过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 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实际上, “看不见的手”提出了一个经济分析框架: 出于利己动机的个人相互进行市场交换, 最终能够增进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现实, 后来成为完全竞争或自由市场的代名词。用认知科学的原型理论看, “看不见的手”堪称经济学理论的原型隐喻。^① 因为斯密之后的不同流派经济学理论都能溯源到它, 众多经济学概念与它都具有家族相似性 (Rosch and Mervis, 1975)。经过历代经济力家的努力, “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发展成为“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 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石 (Arrow and Debreu, 1954; 钱颖一, 2017)。

2. “制度是脚手架”: 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North) 晚年的隐喻定义。制度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概念。但是, 制度究竟是什么, 却是经济学界多年未解决的问题。最为广泛使用的制度概念是诺思在 1990 年提出的操作定义: 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特征 (North, 1990)。然而, 这个操作定义说的是制度包含哪些基本构成部分, 却没说制度究竟是什么。^②

其实,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第一句话, 就开宗明义地表达了

① 在管理学领域, “看得见的手”是一个具有类似原型理论地位的隐喻, 并且它是受“看不见的手”启发而来。在《看得见的手》首页,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 Jr.) 直接阐述主题: 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 他认为, 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源自经济学的管理学隐喻又反哺了经济学理论发展, 使得经济学家更关注生产和分配的微观细节 (组织问题), 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源泉 (Chandler, 1977; Williamson, 1985: 8; 陈凌, 2005)。

② 无独有偶, 社会学和管理学广泛使用的制度概念也是这样的操作定义。美国社会学家 Scott (2014: 59) 的制度定义明确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 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 - 认知要素, 但是并未说明制度究竟是什么。

诺思对制度的基本理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的约束（North, 1990）。在此基础上，青木昌彦（2017）提出了“制度即均衡”的观点。然而，这两种理解都是结果视角上的制度，并未揭示制度的构成性本质。

到了晚年，诺思从认知视角重新思考制度，得出了“制度是脚手架”的隐喻定义。他接受罗纳德·海纳（Ronald Heiner）“不确定性是可预测行为的根源”的观点（Heiner, 1983），认为个体能力与所解决问题难度之间的差距是制度创新的根源。诺思提出，在这些差距面前，人类将会构造一些规则去限制这种条件下选择的灵活性。我们把这些规则称为制度（North, 2005）。随后，诺思直接把制度称为“人类搭建的脚手架”（North, 2005）。显然，这个隐喻定义囊括了诺思代表作早期制度定义的全部内涵，但是更加生动形象，简洁而深刻。深刻之处在于其超越了早期操作定义的静态标准，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构成性认知视角。

3. “剪刀原理”和“价格剪刀差”。在经济学说史上，剪刀曾被多次用作阐述经济规律的生动隐喻，其中，两个非常著名的隐喻是马歇尔“剪刀原理”和“价格剪刀差”。^①

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主要由生产成本决定，他们对生产端做了系统研究，但是忽略了需求端。马歇尔把需求和供给比作“剪刀的两个刀片”，提出了著名的“剪刀原理”：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由供给与需求双方决定，犹如剪刀的两个刀片，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在均衡状态下交叉（Marshall, 2013）。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三次使用剪刀描述需求和供给对价格和工资的影响。这个剪刀隐喻就是广为人知而作为经济学代表符号的“马歇尔十字”，已经成为基础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它为供求分析的技术化处理，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语言表达，打开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大门（Kurz, 2016）。

另一个剪刀隐喻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里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价格剪刀差”的概念由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1926年在《新经济学》中提出（Preobrazhensky, 1965）。斯大林（1955：131-132）接受这个概念并指出，剪刀差“是谈到农民购买工业品仍然要多付一些钱，而出卖农产品仍然要少得一些钱。是谈到这些多付少得的

^① 在阐述“有限理性”概念时，Simon（1956, 1990）也曾用剪刀作为隐喻：一个刀片代表人类认知局限，另一个刀片代表环境结构。

钱就是向农民征收的一种类似‘贡税’的超额税，即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额外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也论述了“剪刀差”问题：“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毛泽东，1976）

“价格剪刀差”这一隐喻形象地概括了工农业产品在交换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国家如何从农民那里赚取利润来补贴城市工人，同时，政府通过实施价格剪刀差加快资本积累速度（贾克诚、张跃庆，1979）。后来，美国学者对“价格剪刀差”发展出一个简洁严谨而有很强解释力的理论模型，我国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颇具价值的理论拓展（Sah and Stiglitz, 1984；林毅夫、余森杰，2009）。

4. “公地悲剧”和“公共池塘资源”：公共经济学的两大核心隐喻。自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经典论文1968年在《科学》发表以后，“公地悲剧”这个隐喻已经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一个象征符号。因为这一隐喻清晰地展示了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逻辑：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是所有人争相奔去的终点。（Hardin, 1968）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隐喻间接佐证了Demsetz（1967）私有财产优于公共财产的观点，二者共同塑造了私有化不可避免和公共所有权必然失败的片面认知。即使长时间受到尖锐批评，“公地悲剧”这个隐喻依然深入人心，塑造着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新闻媒介的思维，构成了“公地话语的惯例”（Goldman, 1997）。

然而，“公地悲剧”这一隐喻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暗淡画面：许多无助的个人陷入了毁掉他们自己资源的残酷进程中。（Ostrom, 1990；Dietz, Ostrom, and Stern, 2003）基于自己早期对加州水资源制度安排的研究经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针对“公地悲剧”提出了自己的“公共池塘资源”隐喻（Ostrom, 1990, 2010）。奥斯特罗姆在这个隐喻基础上发展的社群治理方案突破了传统公共资源治理要么国家要么市场的二选一思维定式，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为解决公地治理的集体行动问题开辟了新的认识空间，告诉人们：公地并不必然就是悲剧，公地占用人具有组织集体行动的动力和能力（Ostrom, 1990, 2010）。

有趣的是，或许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公共品导致市场失灵”命题激发了经济学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公共经济学领域产生和使用了一些著名隐喻，比如“搭便车”和“科斯灯塔”（Samuelson and Scott, 1968）。“搭便车”隐喻凸显了集体行动的内在困境，个人从自己私利出发坐享他人成果，因而个人理性无法达成集体理性（Olson, 1971）。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 以英国灯塔制度为案例生动地阐述了公共品可以由私人提供的经济学观点, 有力地挑战和补充了传统的公共品理论; 之后, “科斯灯塔”成了公共经济学里的一个著名隐喻 (Coase, 1974)。

5. “选美竞赛”以及跟不确定性相关的经济学隐喻。经济学家在惯常的确定性状态下很容易建立漂亮的数学模型, 但是不确定性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模糊状态, 这就为充满想象力的隐喻留下了空间。源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市场分析的“选美竞赛”和“动物精神”就是这样的经济学隐喻。

“选美竞赛”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2章中提出的概念隐喻, 用来解释股票市场投机引发的不稳定性。在竞赛中, 参与者要从100张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6张, 选择结果与全部参与人一起所选结果最接近者得奖。凯恩斯认为, 这里的挑选并不是根据个人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 甚至也不是根据真正的平均的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 而是运用智力来推测一般人所推测的一般人的意见为何 (Keynes, 2018)。其实, 近年来全球火热的 ChatGPT 所提供的答案就是通过大数据算力“来推测一般人所推测的一般人的意见为何”的“选美竞赛”结果。跟选美竞赛一样, “囚徒困境”和“柠檬市场”也是跟不确定性高度相关的两个经济学隐喻 (Poundstone, 1993; Akerlof, 1970)。

在这一章后面, 凯恩斯还指出, 除了投机, 人类本性也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在商人算计和决策中起基本作用, 他称之为“动物精神” (Keynes, 2018)。这是凯恩斯在不确定性方面的另一个概念隐喻。经过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 和罗伯特·席勒 (Robert Shiller) 2009年出版专著予以重新阐述后, “动物精神”已经成为著名的经济学概念, 借以阐述引发经济波动的非理性动机、自然本能等情感基础 (Akerlof and Shiller, 2009)。跟动物精神相似, “黑天鹅”和“灰犀牛”也是喻体具有生物学本源的经济隐喻, 并且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变得全球知名 (Taleb, 2007; Wucher, 2016; Halliburton, 2020)。

除了上面这些著名经济学隐喻, 还有很多经济学理论的论证直接建立在隐喻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逻辑通过隐喻完成: 商品“蛹化”为货币, 货币“羽化”为资本 (马克思, 1972; 马天俊, 2017)。

需要指出的是, 经济学隐喻不仅来源于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 也有对其他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概念体系的借鉴。而且, 较之于源自生活经验的隐喻, 后者生动形象、简洁明了, 而借鉴而来的隐喻对经济学及其理论发展的影响也许

更为深远，因为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概念体系具有相似逻辑的经济学思想，更容易在学界获得正当性。比如，“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隐喻发展起来的”（金碚，2019），理性选择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隐喻（McCloskey，1995），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隐喻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原理（Alchian，1950；Penrose，1952；Hodgson，2002，2008；贾根良，2004）。

（二）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真值条件

在反思“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等隐喻时，奥斯特罗姆指出，当理论模型用作隐喻时，作者旨在指出自然场景与理论模型之间一两个变量的相似性（Ostrom，1990）。确实如此，科学隐喻的生机来源于类比逻辑在隐喻的生成和解释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构成性作用，这种类比逻辑体现为两个类比较配对物在结构上的可达性，类比较配对物之间从字面含义到隐喻含义的接达是通过逻辑语言完成的，达到目标情境与来源情境之间跨情境等同的认知效果（Hesse，1966；Steinhart，2001）。这种隐喻的可达性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结构和真值条件。表1展示了著名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和真值条件。

表1 著名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和真值条件

隐喻	语言结构		真值条件(语用语境)
	本体/目标域	喻体/来源域	
看不见的手	市场机制	手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将抽象繁杂的市场机制类比于手这一身体器官,但“看不见的手”的洞见建立在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思想基础上
脚手架	制度	工具	诺思将制度看作“人类搭建的脚手架”,这是从人类认知视角出发的起源性定义,把抽象的制度还原到人类日常生活场景中
剪刀原理	供给与需求	剪刀	马歇尔将供给和需求对价格和产量的影响具象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剪刀使用,直观生动
价格剪刀差	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	“价格剪刀差”的形象不仅体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指数曲线上,还意味着不等价交换中被剪下的一块

续表

隐喻	语言结构		真值条件(语用语境)
	本体/目标域	喻体/来源域	
公地悲剧	公共资源	牧场	哈丁的隐喻将公共资源看作一块自由进入的牧场,容易让人们在脑海里浮现出直观的画面
公共池塘资源	公共资源	池塘	奥斯特罗姆的隐喻将公共资源看作一个自由取水的池塘,容易激活人们日常的打水经验
选美竞赛	股票价格波动	选美	凯恩斯用选美竞赛隐喻来描述股票价格波动背后的动力在于参与者想象中的共识
囚徒困境	博弈决策	囚犯自利	“囚徒困境”隐喻的成立在于人的复杂性及其行为的不确定性,其心理活动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麻秆打狼,两头怕”
柠檬市场	商品质量	柠檬(次品)	“柠檬市场”隐喻很生动地展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也是人们对信息不对称(俗语“买家没有卖家精”)的市场反应
黑天鹅	小概率但影响巨大的事件	黑天鹅	“黑天鹅”隐喻凸显了小概率但是影响巨大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正如前几年全球范围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
灰犀牛	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	“灰犀牛”隐喻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危险信号出现时的自我蒙蔽以及出现问题时的互相推诿和不作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经济学隐喻呈现的是科学隐喻“S是P”的基本语言结构,包含了隐喻的三个元素:本体、喻体和连接词。在认知语言学里,本体和喻体经常被称为“目标域”和“来源域”,喻体是理解本体的渠道和工具。在很多情形中,本体形式上缺位,但仍然潜在地蕴涵在相关语境中,比如很多经济政策里的陈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连接词是科学隐喻的灵魂,比如“制度是脚手架”,通过隐喻连接词“是”在制度和脚手架之间构成一种跨情境等同关系,从而创造出科学隐喻的张力结构。当然,本体的形式缺位也带来连接词的形式缺位。这样,经济学隐喻就具有本体隐蔽而喻体凸显的语言结构。

科学隐喻的目标是在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建立相同或近似的功能角色,

其逻辑喻底是类比，而最纯粹最有力的类比就是形式同构，形成完美的关系对应（Steinhart, 2001）。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类比都是隐喻。比如“辽宁的大连就是山东的青岛”就只是类比，但不是隐喻。因为隐喻既有字面意义，也有隐喻意义。因此，对于隐喻来说，类比是必要条件，但是不充分。

这种类比超越字面意义而产生隐喻意义的真值条件是来源概念与目标概念必须来自不同但可以类比的领域（Kittay, 1989; Steinhart, 2001）。隐喻的构建就是不同领域的概念整合，在类比逻辑上完成两个领域的经验映射（Fauconnier and Turner, 1998）。正是不同的意义语境让隐喻完成了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嵌入性实现，将鲜明的文字意思转换成具有颠覆性的隐喻，获得喻体与本体互动而来的认知张力（郭贵春, 2004）。

使来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产生隐喻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不同语境状态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在类比逻辑上建立两个领域的跨情景等同（Steinhart, 2001; 郭贵春, 2004）。认知科学的革命性进展揭示了一个一直被遮蔽的重要事实：由身体经验形成的“原型隐喻”在人类的认知和概念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安军, 2017）。所有的科学隐喻都必须在具体的语用语境中加以理解和把握，正是语境使隐喻从字面意义的静态呈现转为隐喻意义的动态生成，完成 de Saussure（1983）指出的从能指到所指的飞跃。在理解抽象的科学概念时，人类一般都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经验和身体经验进行隐喻映射，把陌生的新事物转化为熟悉的亲身经验（Lakoff and Johnson, 1999）。因此，只有在语境限定和规约下，经济学家才能使用隐喻表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殷杰、祁大为, 2019）。

三、隐喻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两个隐喻典范

如何使用隐喻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隐喻作为经济学方法论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这里，本文先提供两个成功的隐喻典范。

第一个典范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歧视经济学》。在考察种族偏见这一争议问题时，贝克尔没有使用数理统计等常规经济学分析工具，而是几乎完全依赖隐喻，在相似性类比基础上发展出全新的理论见解（贝克

尔, 2019)。一开始, 贝克尔就宣称寻找无形的非市场价值 (“非货币动机”) 与商品之间的相似点, 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完全竞争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贝克尔的第一个隐喻是把歧视的情感看作商品, 他认为我们可以评估一个人愿意为歧视的 “特权” “付出或损失” 多少。紧接着, 贝克尔对歧视进行定义, 他认为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既不是对他们价值的系统性诋毁, 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否认或选择的限制, 而是一种偏好。因为歧视通常跟因接触某些人而产生的负效用有关。这就是他的第二个隐喻: 歧视是一种偏好。这样, 歧视就变成了一种可以进行经济学测量的自然行为: 对歧视的偏好会让消费者 “购买” 歧视性行为; 对某些人来说, 歧视不仅能带来精神上的回报, 还能带来经济上的回报。

第二个典范是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 Schultz) 的人力资本理论。在舒尔茨的代表作《人力资本投资》1961年发表之后, 人力资本投资为全球经济学界和实践界广泛接受 (Schultz, 1961; Bowman, 1980)。人力资本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本体隐喻, 把人的能力和素质看作资本。之后, 对待人类技能与对待机器投资的两个经济学领域一下子统一起来, 劳动经济学、资本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三个领域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同时, 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的产生还有一段有趣的隐喻渊源。他做农业经济研究时访谈了阿拉巴马州的一对穷困农民老夫妇, 并很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惊讶。当他问道: “你们这么贫穷, 为什么会感到如此满足呢?” 他们回答: “你错了, 教授。我们并不贫穷。我们用自家农场的收成供四个孩子上大学, 我们把肥沃的土地和满满的牲畜圈变成了法律知识和拉丁语知识。我们很富有。” (McCloskey, 1990: 13) 显然, 这对农民夫妇的回答可以看作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的生活原型, 他们使用了管道隐喻——土地、牲畜圈等有形资本通过 “上大学” 这一管道变成了法律知识、拉丁语知识等无形的人力资本。

(二) 隐喻与模型的关系

经济学已经为数学语言所支配。经济学模型通过数学公式呈现经济现实的逻辑关系, 增加了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Samuelson, 1952; Debreu, 1984, 1991)。因此, 有必要说明隐喻和模型在理论逻辑上的异同。

科学思维的识别特点是使用模型 (Hesse, 1966)。模型不仅在科学理论中极为常用, 它本身也是参与科学理论构建的 “硬核”。在当代世界, 作为一

种重要的科学工具，模型的意义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有没有完善的科学模型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模型的作用在于解释理论说明对象的性质和结构关系，包含了对经验环境的符号模拟和理念复制，实际上就是说明对象的逻辑映射，因而所有模型在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科学工具（Bradie, 1998；Brown, 2003）。

如果说模型是对客观现实的科学解释，那么隐喻则是对客观现实的语境化把握（郭贵春，2004）。隐喻和模型之间具有“一种深层次的平行关系：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模型，无论其复杂程度多么高，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其说明对象的隐喻”（安军，2017：65）。从逻辑上看，模型是演绎推理，而隐喻则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Rosch and Mervis, 1975）。从隐喻到模型是从类比逻辑到因果逻辑的发展，体现了一种从无意识的直觉性到意向性突出的科学构建。从模型到隐喻，则是从科学理论到社会环境的情景还原，体现出一种直觉洞察的认知创造。

跟传统经济学模型的演绎推理不一样，隐喻则是人们在模式联想中“涌现”而来的（Arthur, 2015；胡壮麟，2020）。认知科学研究表明，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像数学家那样去演绎，而只会像小学生那样去类比联想；大脑对大量联想进行处理，建立事物之间的关联，将他们集结成模式，形成各种各样的隐喻（Gazzaniga, Ivry, and Mangun, 2014；Arthur, 2015）。这些发现背后有着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对人类大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类比和隐喻可靠地激活一致但可分离的大脑区域（Vartanian, 2012）。

从思想的语言角度看，思想概念结构既可以是命题式的，也可以是意象式的；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命题式观点，将概念视为以“思维语”的方式存在的表达式，其典型为模型；然而，思想也可以是意象式表征（Fodor, 1979）。隐喻就是这样的意象式思想产品。在借助简单概念成分描写复杂结构方面，隐喻的精确性并不亚于命题和模型。

（三）隐喻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独特贡献

前面所讨论经济学隐喻的解释力来自这些隐喻对经济现实的情景还原。这种情景还原不是一般的感性认识，而是经过理性认识后的抽象的生动（毛泽东，1991）。“看不见的手”“选美竞赛”“动物精神”“脚手架”“价格剪刀差”“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黑天鹅”等隐喻在全世界都耳熟能详，

就具有这种抽象的生动，具有内行不觉得浅而外行不觉得深的通透。

这些情况表明，隐喻具有涌现性的认知力量，能够对经济现象进行独特而新颖的刻画。映射联想是隐喻最具穿透性的内在力量（Lakoff and Johnson, 2003）。隐喻不仅通过映射联想使经济学理论的呈现具有生动鲜活画面感，还能够将经济学理论与更大的社会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让经济学理论因所用隐喻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变得可信（Lakoff and Johnson, 1999）。归根结底，现代经济学还是一门跟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的社会科学，具有天然的环境嵌入性，不能脱离理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Granovetter, 1985; Barber, 1995; 钱颖一, 2017, 2018）。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是人们对事物形成一致性认识的过程，当隐喻或模型能够准确地解释研究对象时，就形成了一致性结论（Romer, 2015）。

想象在隐喻的意义构建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一定程度的想象对经济研究有益。一个好的隐喻能够生动地把它要呈现的理论意义“置于眼前”。这是隐喻在意义构建上的刻画功能（Ricoeur, 1978）。正是“置于眼前”的刻画功能，经济学隐喻的构建既能把自己当方法，也能把读者和受众当方法，达成经济现实上的认知共鸣，从而对经济现象做出具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观察、刻画和解释（McCloskey, 1990; 陈向明, 2000）。用爱因斯坦（2009）的话说，隐喻能够让经济学“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

正如亚里斯多德（2015）（又译亚里士多德）所说，“普通的语词仅仅能够传达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正是通过隐喻我们才能最充分地把握住新鲜事物”。在认知意义上，隐喻起源于对世界感应信息的共鸣，它不仅仅是已知相似性和类比的华丽表达，而且是未知相似性和类比的认知来源（Lewis, 1996; Lakoff and Johnson, 2003）。这样，新隐喻具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使用新隐喻刻画经济现象时就重新建构了我们眼前的经济现实（Lakoff and Johnson, 2003）。对理论创新来说，隐喻的长处在于它使经济学理论对新现象新事物保持“开放”状态，重新建构我们眼前的经济现实，踏破理论未知的虚空，拓展理论的经验疆界，对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一种微妙的“指引”和探索（McCloskey, 1983; Lakoff and Johnson, 2003; 殷杰、祁大为, 2019）。前面讨论过的歧视经济学和人力资本概念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们具有一种用尚未见识的含义使我们震惊的能力，这是成功的科学理论所推崇的品质（McCloskey, 1983）。

有科学哲学家指出，“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隐喻革命”（Arbib and Hesse, 1986）。在语言结构上，来源域的喻体的作用就是给目标域的本体提供新信息，在新的概念域里理解本体，因而不同的隐喻意味着不同的新认知。隐喻就是两种不同事物的思维一起活动，其意义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隐喻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流，是语境之间相互有利的交换（Richards, 1936）。即使在已经成熟的学术领域，新的隐喻也能让经济研究获得新的理论机会，重组经济现实的理论意义。这样，经济学知识之树才会源源不断地长出新的枝丫，甚至一些已经被认定枯死的枝丫也可能突然萌发出新芽（Kurz, 2016）。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诸多流派的发展都呈现了这样的成长过程。

（四）经济学隐喻的构建

理论创新很难，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学隐喻也不容易。好的隐喻既需要满足前面讨论的语言结构和真值条件，同时又要能够生动准确地呈现所映射的经济学理论，做到抽象理论与鲜活经验的深度融通。

跟文学故事一样，经济学隐喻的建构也必须有所选择（McCloskey, 1990）。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描述任何事物，同时也不需要完全描述。隐喻的核心特点在于其解释焦点同时具有凸显和遮蔽的功能，限制我们注意什么，凸显我们被期望看到什么，为我们的推理结构提供一个关键构件（Lakoff, 1991）。隐喻选择性地框定信息，引导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解释（Goffman, 1986）。这样，隐喻就达到了概念性简化的效果，以生动鲜活的画面在读者和受众的头脑中铺展。

经济学隐喻的构建关键在于找到所研究经济现象的范畴原型。原型理论认为，范畴成员之间存在不对称现象，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更能代表这一范畴，它们具有更多的与同类其他成员共有的属性，并具有更少的与相邻类别的成员共有的属性。这些来自鲜活经验的中心成员就是范畴的原型。同时，范畴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情境性的过程。实验显示，被试是美国人时，橙子是“水果”范畴的原型，被试换成中国人时，“水果”原型就变成了苹果或梨（Rosch, 1975；Rosch and Mervis, 1975）。前面讨论的“柠檬市场”隐喻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柠檬”就是阿克洛夫模型的原型。

范畴原型被找到后，还有一个概念整合工作，完成从旧意义到新意义的创造性认知操作，用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形成强关联性隐喻（黄华新，2020）。但是，概念整合中的隐喻生成是一个动态而灵活的过程，接近于文学创造中的灵感迸发（Turner and Fauconnier, 1999）。概念整合就是寻找和确认事物本身的客观相似性，或者创造理解事物的主观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寻找、确认和创造，容易形成认知、想象和情感上的共鸣，使隐喻不是奥秘而是奥秘的解答，从而完成本体和喻体两个概念域的跨情景等同（Ricoeur, 1978; Steinhart, 2001）。一个好的隐喻通过使用直接适合一方的语言作为观察另一方的透镜，具有将两个独立的概念域带入认知和情感关系的能力（Black, 1962）。经济学隐喻的洞察力来源于对本体与喻体两个概念域之间概念语义相似性的重新整合，使科学概念与鲜活经验的新关联生成新的理论意义（郭贵春，2004）。

综上所述，经济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将一般隐喻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对经济学的理论呈现进行穿透性解释和说明，帮助经济学理论完成从抽象概念到经济现实的语境还原，获得抽象概念和鲜活经验的深度融通。大道至简，莫不如此。

四、隐喻与经济学的社会沟通

（一）“晋升锦标赛”：经济学理论感染力的隐喻典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 40 多年的持续增长。这背后的激励机制是什么，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试图破解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谜”。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有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其核心观点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带来自主决策权（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Qian and Weingast, 1997; 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5）。然而，周黎安认为，由于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的行为背后有超越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的更基本的激励力量。在此基础上，周黎安提出了将行政权力和强激励融为一体的“晋升锦标赛”隐喻（周黎安，2007）。

周黎安（2007）的成功之处可以从两方面说明：首先，在因果逻辑上讲清楚了官员晋升模式与中国高速增长的内关联，为研究中国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开创了新的视角，并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独特的

答案；其次，“晋升锦标赛”是一个成功的经济学隐喻，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想象力和穿透力，在社会沟通中具有很强的感染性。

从隐喻角度看，“晋升锦标赛”具有典型的隐喻语言结构（“官员晋升是锦标赛”），也满足两个概念域跨情境等同的隐喻真值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个隐喻成功具有非常坚实的历史现实基础。官员晋升锦标赛背后的制度基础是中国“条条块块”经济体制中的“块块关系”，属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包含的“地方与地方”关系（毛泽东，1976；吴敬琏，1986，2014）。

对于解释中国持续增长奇迹来说，“晋升锦标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替代“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在于前者既深谙中国现实同时又具有全球性的解释力，无需专业知识，对体育比赛稍有接触或了解的人都清楚其道理。后者则是一个具有美国文化内核的概念，多少有些削足适履，何况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而且历史上的类似现象“诸侯割据”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贬义词。

（二）隐喻的沟通力量：1969—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文献实证统计

经济学中的隐喻使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里，本文使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被引数据做了一个量化分析。之所以选择诺奖得主，是因为他们是196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里最为杰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虽然诺奖得主之外不乏杰出的经济学家，但将样本限定在这个群体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争议，同时这个群体的文献实证统计结果能够更有力地展现隐喻的沟通力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设立到2022年，共颁发了54次，92位经济学家获奖，其中，有33位经济学家使用了隐喻。关于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本文采用了Web of Science（WOS）的被引数据。这些经济学家的平均被引次数是13008次，诺奖得主前10篇和前5篇高被引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分别为9019次和7213次，分别约占总被引次数的69%和55%，如此高的集中度说明诺奖得主们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也正是这些数量较少的代表作。

图1报告了隐喻与诺奖得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全样本还是考虑不同的子样本，使用隐喻均有利于提高诺奖得主的被引次数。然而或许由于本文的样本量比较小，这些关系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图

1的结果实际上是隐喻与平均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但是有可能这种关系存在巨大的异质性，比如对于那些较大影响的研究，隐喻或许会进一步放大其影响。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Koenker and Bassett, 1978）来检验隐喻对不同分位数处被引次数的影响，具体结果呈现在图2中。在其他特征相同条件下，使用隐喻会显著减少低被引（0.05分位数和0.1分位数处）诺奖得主的影响力，但是会显著增加高被引（0.8—0.95分位数处）诺奖得主的影响力，而对被引次数居中（0.15—0.75分位数处）的诺奖得主几乎没有影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隐喻在被引次数分布不同位置处的影响有所差异导致平均影响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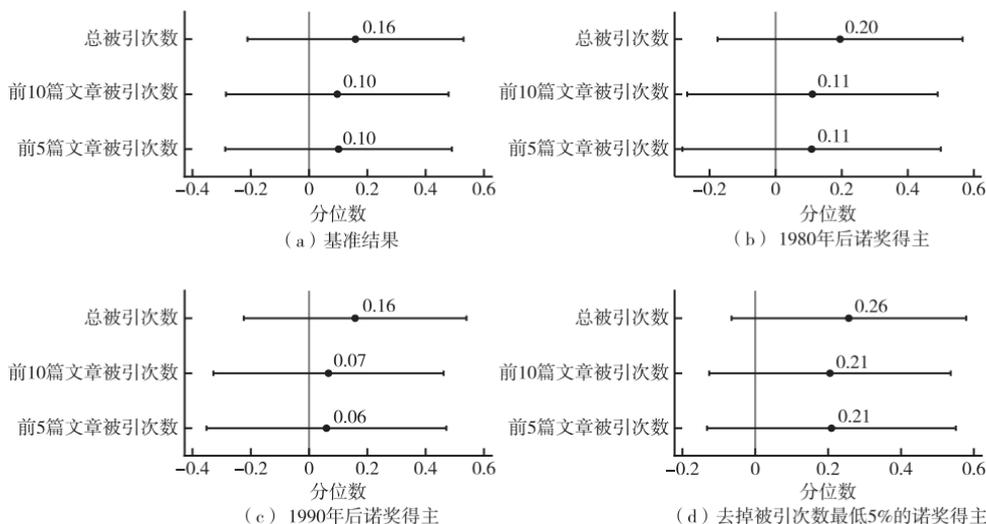


图1 隐喻和诺奖得主被引次数：OLS回归

资料来源：WOS。

注：被解释变量是被引次数取对数；所有回归中都控制了研究领域、文章数量、截至2022年已去世年份、第一篇文章发表的年份，以及是否美国籍；图中线段表示90%置信区间。

但图2结果也表明，如果目标是做出高影响力的研究，合理的隐喻使用会进一步放大影响力。

（三）从“隔”到“不隔”：经济学的隐喻沟通

亨利·斯皮格尔（Henry Spiegel）在《经济思想的成长》导言里曾经指出，数学的渗透造成了经济学在社会沟通上的断裂：过去，经济学家可以轻易地把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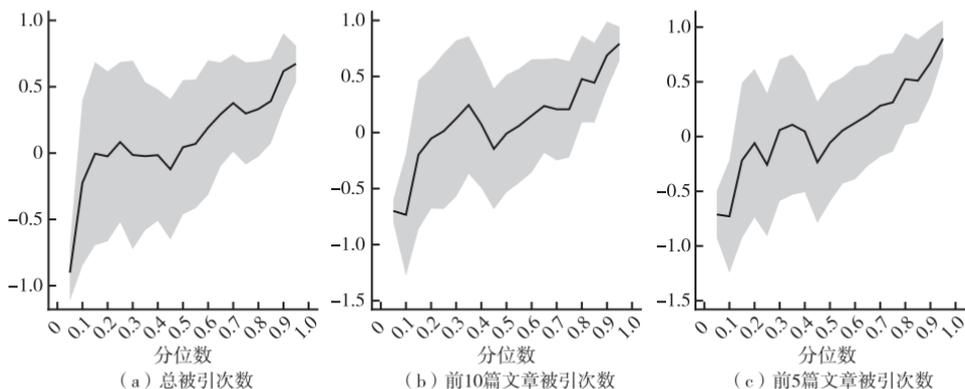


图2 隐喻和诺奖得主被引次数：分位数回归

资料来源：WOS。

注：图中的阴影表示90%置信区间；分位数回归的模型设定与图1中的模型一致。

己的见解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但是现在的经济学不再是一个有才华的门外汉可以容易理解的，其中，大部分内容只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把握。(Spiegel, 1991) 我国经济学家也有相似批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大量论文表现得高水平、很深奥、充满复杂公式，非同行专业人员难以读懂。”(金碚, 2019)

隐喻能够弥补经济学在社会沟通上的断裂。用隐喻的话说，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上山的过程，但是大部分学者经常忽略上山后的下山工作。隐喻的构建和使用能够帮助解决经济学研究后期的下山问题，将以往依赖于抽象模型和数理统计的经济学理论还原到有温度、能感知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理解，达到社会沟通的深入浅出，“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亚里斯多德, 2015)。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诗词境界的“不隔”标准：“妙处唯在不隔”，“话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王国维, 1998: 9-10)。“看不见的手”“选美竞赛”“动物精神”“脚手架”“价格剪刀差”“公地悲剧”“囚徒困境”“晋升锦标赛”“黑天鹅”等经济学隐喻的成功之处，也在这里：不隔。

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认为，经济学有四大修辞法宝：事实、逻辑、故事和隐喻。前两个属于科学，后两个属于人文，故事依靠联想，而隐喻依靠相似性。然而，真正出彩的经典研究四个都用。其中，隐喻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McCloskey, 1990, 1995)。这方面的典范是斯密的《国富论》以及“看不见的手”。

一个好的隐喻构建和使用，能够让研究变得有趣，使艰深的经济学理论完成从“隔”到“不隔”的沟通转换。隐喻能够让经济学理论变得更有个性，容易激起人们认知、想象和情感的共鸣，在日常谈话中就很轻松地得到传播（Ricoeur, 1978）。在进行跨学科沟通时，隐喻的作用尤其突出，它的力量在于作为不同科学表达方式之间转换工具的能力。（Pauwels, 2013）

在《黑天鹅》中，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用生动事例说明了理论传播的内在逻辑：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其传染性，而不是其正确性。（Taleb, 2007）

无独有偶，经典社会学文献《那是有趣的！迈向社会学的现象学与现象学的社会学》也有相似的表达：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伟大的，并不在于其理论是正确的，而是它们是有趣的（Davis, 1971）。一般来说，完美构建的理论未必能够引人注目，只有有趣的理论才可以真正抓住受众的眼球，与受众建立真实有效的对话。显然，这篇文献回答了一个困扰绝大多数学者的重要问题：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得到关注。

五、让隐喻说话：讲好中国发展的经济学故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里，大多数中国经济研究工作都处于学习、模仿和追赶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在《经济研究》创刊 60 周年时，钱颖一提出了中国经济研究“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改革初期“经济研究很具有思想性，但是学术性并不够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术规范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似乎思想性显得不够了”，希望发展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钱颖一，2015）。

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2020）。然而，这些实践经验非常复杂，置身事外的国外学者多半处于雾里看花状态，而富有鲜活经验的中国学者则比较容易看透经济现象背后的理论机制，让自己的理论研究具有通透的质感。林毅夫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渠道”，“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林毅夫，1995）。

好的隐喻能够助力研究成果国际化。前几年美国政治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一隐喻不仅形象地刻画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还具有强大的议题设定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几年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Allison, 2017）。

本文相信，作为思想创造的重要方法论，隐喻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学找到一些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发展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理论新思想。

第一，中国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各级政府以世界罕见的深度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同时，经济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制度演变（钱颖一，2015）。这种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变的长期互动为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机会。

同时，这条原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基础/建筑隐喻”（Hall, 1977; Wood, 1995）。它是一个以房屋为原型的空间隐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地基，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制度是地上房屋；同时，它也是具有上下空间关系的方位隐喻（Lakoff and Johnson, 2003）。由于隐喻的本质就是根据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事物。在这个隐喻视角下，我们能够获得一个重新思考这条基本原理的理论空间。尤其是到了目前的数字经济时代，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什么因素决定，经济基础如何决定或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经济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欧亚国家，涉及世界人口的约三分之一。从经济增长率和可持续性来看，中国都表现最好（钱颖一，2017）。因此，中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经验是一座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宝矿，如果将从中发现的道理上升为一般规律，不仅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有所贡献，反过来还能加深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比如“价格双轨制”。它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转轨经济学隐喻，生动地刻画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要实践，并在2011年11月7日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作为一个过渡性制度，“价格双轨制”帮助中国经济市场转型建起了至关重要的市场一轨，同时又能激励相容，因而它对于理解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有重要的普遍性理论意义（钱颖一，2017，2018）。然而，目前“价格双轨制”依然停留在隐喻阶段。

如果有一天被发展为数学模型，或许能够看清楚价格双轨制背后的激励机制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

第三，中国公地治理经验与公共经济学。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两个公共经济学隐喻——公地悲剧和公共池塘资源——面对的都是传统的公共资源，无法应对目前正在成为全球重大挑战的新兴的非传统公地，比如前几年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此外，互联网（属于当前信息时代的数字公地，尤其是人工智能在使用海量数据中的人机伦理）和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学界称之为终极公地问题）等，也是典型的非传统公地（Stavins, 2011; Ansari, Wijen, and Becker, 2013）。这些挑战都显示了发展出公共经济学新隐喻的迫切需要。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公共资源实践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学者们也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研究（Edmonds, 1999; Liu, 2010）。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欧美传统理论的应用，较少涉及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在公共资源管理上具有漫长丰厚的文化经验积淀，比如自上古传说大禹治水以来的黄河治理，或许能够发展出符合中国现实而又具有普遍性的公共经济学新隐喻。

第四，数字经济与企业理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数字环境下，谷歌、阿里、腾讯、美团等互联网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称呼，即“平台型企业”。然而，“平台型企业”还只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经济现象，目前算不上严谨的理论概念。因为“平台型企业”正在挑战传统企业理论的容器隐喻预设：“企业是理性系统”（Boulding, 1956; Lakoff and Johnson, 2003）。生产、激励、晋升等组织活动发生在容器里，交易发生在容器外，企业的性质和边界容易确定，剩余控制权也很清楚（Coase, 1937; Grossman and Hart, 1986）。

然而，对于“平台型企业”来说，责任边界正在变模糊，比如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劳动关系的确认难题。那么，从隐喻视角看，“平台型企业”还是容器吗，抑或是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月台？如果变成以火车站月台为原型的平台隐喻，组织身份、交易成本、层级制、激励等传统经济学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这样一来，基本隐喻的变化就给企业理论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或许需要重新更新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政策法规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更新和调整，因为法规政策背后的隐喻预设会显著地影响其社会后果。

同时，网络平台企业所培育的中国网红经济和直播带货发展迅速，给现代经济学带来了理论解释的挑战。与传统经济活动（包括互联网经济）不同，

说服成为更关键的经济环节。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市场是一种对话”隐喻或许能够为这种经济现象提供独特而有力的解释视角。在现代经济中，四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不是命令或信息，而是说服，尤其是甜言蜜语（McCloskey and Klamer, 1995）。到了直播带货的互联网平台上，头部网红主播传递给粉丝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甜言蜜语了，而是药力强劲的“迷魂汤”。或许这就是直播带货迅速取代传统电商（提供充分信息）而成为新兴数字经济形态的根本原因，这也给重新理解市场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机会。

随着平台型企业对消费者数据的海量掌握，如何理解数据的产权性质是一个亟待澄清的基础理论问题。如前所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蛹化”“羽化”隐喻描述了交换过程中“商品—货币—资本”一系列商品形态变化（马克思，1972；马天俊，2017）。这个隐喻或许能够为中国经济学澄清或建构“数据—货币—资本”的数据形态变化提供理论发现的基础逻辑。

综上所述，为了讲好中国发展的理论故事，中国经济学需要让隐喻说话，让新理论新思想破茧而出，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

参考文献：

- 爱因斯坦，2009，《探索的动机》，载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
- 安军，2017，《科学隐喻的元理论研究》，科学出版社。
- 柏拉图，1986，《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 贝克尔，2019，《歧视经济学》，于占杰译，商务印书馆。
- 陈凌，2005，《超越钱德勒命题——重新评价〈看得见的手〉》，《管理世界》第5期。
-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 郭贵春，2004，《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胡壮麟，2020，《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华新，2020，《认知科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霍布斯，1985，《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 贾根良，2004，《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贾克诚、张跃庆，1979，《关于剪刀差》，《经济研究》第1期。
- 金碚，2019，《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第2期。
- 李河，2020，《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中国社会科学》

第10期。

林毅夫, 1995,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 《经济研究》第10期。

林毅夫, 2017, 《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 《经济研究》第5期。

林毅夫、余森杰, 2009, 《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 《经济研究》第1期。

陆蓉、邓茂鸣, 2017, 《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 《管理世界》第11期。

马克思, 1972, 《资本论》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马天俊, 2017, 《蛹隐喻: 〈资本论〉的一种阐述方式》, 《哲学研究》第9期。

毛泽东, 1976, 《论十大关系》, 《人民日报》12月26日。

毛泽东, 1991, 《实践论》,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钱颖一, 2015, 《新常态下的经济学创新》, 《经济研究》第12期。

钱颖一, 2017,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中信出版社。

钱颖一, 2018,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二版), 中信出版社。

青木昌彦, 2017, 《制度经济学入门》, 彭金辉、雷艳红译, 中信出版社。

斯大林, 1955,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王国维, 1998, 《人间词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敬琏, 1986, 《冲破条块割据的“藩篱”》, 《人民日报》4月7日。

吴敬琏, 2014, 《中国的市场仍被条条块块所切断》, 《北京日报》6月23日。

习近平, 2020,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8月24日。

亚理斯多德, 2015, 《亚理斯多德〈诗学〉〈修辞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殷杰、祁大为, 2019, 《论经济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 《江海学刊》第1期。

赵汀阳, 2018, 《关注时代问题与思想本身》, 载沈湘平主编《京师文化评论》春季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黎安, 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第7期。

Akerlof, George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 488 - 500.

Akerlof, George A., and Robert J. Shiller.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chian, Arme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3): 211 - 221.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Ansari, Shahzad S. , Frank Wijen, and Barbara Becker. 2013. “Constructing a Climate Change Logic: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 *Organization Science* 24 (4) : 1014 – 1040.
- Arbib, Michael A. , and Mary B. Hesse. 1986.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row, Kenneth J. , and Gerard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3) : 265 – 290.
- Arthur, W. Brian. 2015.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ber, Bernard. 1995. “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 :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and Beyond.” *Social Research* 62 (2) : 387 – 413.
- Black, Max.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laug, Mark. 1992.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lding, Kenneth E. 1956. “General Systems Theory: The Skeleton of Science.” *Management Science* 2 (3) : 197 – 208.
- Bowman, Mary J. 1980. “On Theodore W. Schultz’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2 (1) : 80 – 107.
- Boyd, Richard. 1993. “Metaphor and Theory-Change: What is ‘Metaphor’ a Metaphor for?”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edited by Andrew Ortony, pp.481 – 5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die, Michael. 1998. “Models and Metaphors in Science: The Metaphorical Turn.” *Protosociology* 12: 305 – 318.
- Brown, Theodore. 2003. *Making Truth: Metaphor in Science*.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ao, Yiming, and Shuo Chen. 2022. “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 – 191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 (5) : 1555 – 1590.
- Chandler, Alfred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16) : 386 – 405.
- Coase, Ronald H. 1974.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7 (2) : 357 – 376.
- Davis, Murray S. 1971. “That’s Interesting!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4) : 309 – 344.

- de Saussure, Ferdinand.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Harris, R.) . Oxford: Pergamon Press.
- Debreu, Gerard. 1984. “Economic Theory in the Mathematical Mo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3): 267 – 278.
- Debreu, Gerard. 1991. “The Mathematis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 1 – 7.
- Demsetz, Harold.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2): 347 – 359.
- Dietz, Thomas, Elinor Ostrom, and Paul C. Stern. 2003. “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 *Science* 302 (5652): 1907 – 1912.
- Edmonds, Richard. 1999.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 Years On.” *The China Quarterly* 159: 640 – 649.
-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8.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Cognitive Science* 22 (2): 133 – 187.
- Fodor, Jerry A. 1979.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eud, Sigmund. 1952.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Gazzaniga, Michael S. , Richard B. Ivry, and George R. Mangun. 2014.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Biology of the Mi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Goffman, Erving. 1986.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M. 1997. “Customs in Common: The Epistemic World of the Common Scholars.” *Theory and Society* 26 (1): 1 – 37.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53 – 81.
- Grossman, Sanford J. , and Oliver D. Hart.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4): 691 – 719.
- Hall, S. 1977. “Rethinking the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Metaphor.” In *Papers on Class, Hegemony and Party*, edited by J. Bloomfield, pp. 43 – 72.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alliburton, Benjamin B. C. 2020. “COVID-19 is a Black Swan.” *Forbes*, March 19.
- Hardin, Garri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3859): 1243 – 1248.
- Harris, Fraser. 1912. “The Metaphor in Science.” *Science* 36 (922): 263 – 269.
- Heiner, Ronald. 1983.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4): 560 – 595.

- Hesse, Mary. 1966.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Hodgson, Geoffrey M. 2002.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2 (3): 259–281.
- Hodgson, Geoffrey M. 2008. "How Veblen Generalized Darwinis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2 (2): 399–405.
- Huang, Zhangkai, Lixing Li, Guangrong Ma, and Lixin Colin Xu. 2017.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8): 2455–2478.
- 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9–10): 1719–1742.
- Keynes, John M. 2018.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ittay, Eva F. 1989. *Metaphor: Its Cognitive Force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enker, Roger, and Gilbert Bassett. 1978.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 46 (1): 33–50.
- Kuhn, Thomas. 1993. "Metaphor in Science."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edited by Andrew Ortony, pp. 533–5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rz, Heinz D. 2016. *Economic Though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1990.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1991.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Peace Research* 23 (2/3): 25–32.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wis, Paul A. 1996. "Metaphor and Critical Realism."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4 (4): 487–506.
- Liu, Jianguo. 2010. "China's Road to Sustainability." *Science* 328 (5974): 50.
- Marshall, Alfred. 2013.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cCloskey, Deirdre N. 1983.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1 (2): 481–517.
- McCloskey, Deirdre N. 1990. *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Closkey, Deirdre. 1995. "Metaphors Economists Live By." *Social Research* 62 (2): 215–237.
- McCloskey, Deirdre, and Arjo Klamer. 1995. "One Quarter of GDP is Persua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2): 191–195.
-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1): 50–81.
- North, Dougla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 C.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ancur.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2010.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3): 641–672.
- Pauwels, Eleonore. 2013. "Mind the Metaphor." *Nature* 500 (7464): 523–524.
- Penrose, Edith Tilton. 1952. "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 (5): 804–819.
- Poundstone, William. 1993. *Prisoner's Dilemma*. New York: Anchor Books.
- Preobrazhensky, Evgeny A. 1965.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Qian, Yingyi, and Barry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4): 83–92.
- Richards, Ivor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aul. 1978. "The Metaphorical Process as Cognition, Imagination, and Feeling." *Critical Inquiry* 5 (1): 143–159.
- Romer, Paul M. 2015.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105 (5): 89–93.
- Rosch, Eleanor.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3): 192–233.
- Rosch, Eleanor, and Carolyn B. Mervis. 1975.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4): 573–605.
- Sah, Kumar, and Joseph Stiglitz. 1984. "The Economics of Price Sciss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 125–138.
- Samuelson, Paul A. 1952. "Economic Theory and Mathematics: An Apprais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 (2): 56 – 73.

- Samuelson, Paul A. , and A. Scott. 1968.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 Hill.
-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1): 1 – 17.
- Scott, Richard. 2014.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hiller, Robert J. 2017. “Narrative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4): 967 – 1004.
- Simon, Herbert A. 195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s.”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2): 129 – 138.
- Simon, Herbert A. 1990. “Invariants of Human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1: 1 – 19.
- Smith, Adam. 197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ith, Adam. 2002.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ng, Zheng, Kjetil Storeslette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2011.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 196 – 233.
- Spiegel, Henry W.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hart, Eric C. 2001. *The Logic of Metaphor: 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 Stavins, Robert N. 2011.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 Still Unsettled after 100 Ye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 81 – 108.
- Taleb, Nassim N. 2007.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Turner, Mark, and Gilles Fauconnier. 1999. “A Mechanism of Creativity.” *Metaphor and Beyond: New Cognitive Developments* 20 (3): 397 – 418.
- Vartanian, Oshin. 2012. “Dissociable Neural Systems for Analogy and Metaphor: Implications for the Neuroscience of Creativit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3 (3): 302 – 316.
- Watson, John B. 1924. *Behavioris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 Weber, Max. 2001.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London: Macmillan.
- Wood, Ellen M. 1995.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cher, Michele. 2016. *The Gray Rhino: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etaphors in Economics: Discussing How to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in Economics

Peng Changgui^a and Zhao Guochang^b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

Abstract: How to tell a good economic story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original economic theories and thoughts are the common challenges for Chinese economists. We believe that using metaphor can be an effective way for Chinese economists to find a breakthrough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ome famous economic metaphors such as "invisible hand" have a particular linguistic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a remarkable vehicle and a hidden topic, and their true condition is the logical analogy and experiential mapping of different conceptual domains. Therefore, metaphor is an inevitable methodology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metaphor lies in applying general metaphor thought to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economics, providing insightful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presentation of economics, assisting economic theories in transitioning from abstract concepts to the contextual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reality, and achieving the deep consilience between abstract concepts and fresh experienc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economic metaphor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Our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the works of Nobel Prize winners in Economics from 1969 to 2022 shows that Nobel Prize winners generally use metaphors to describe their ideas, and the metaphor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which is especial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those highly influential studies. Finally,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metaphors in telling a good Chinese story in economics.

Keywords: Metaphor, Economics,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A10, B10, B20, B40

(责任编辑: 何 伟)